基于整体性视角的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

郭庆松

[摘　要] 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整体性探究，就是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历史发展和实践遵循。从理论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和治国智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从历史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对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性的追寻与遵守。从实践逻辑看，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坚持”重大原则是我们系统解决问题必须紧紧扭住的“牛鼻子”，构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统领、根本方向、根本立场、根本动力、根本品格。

[关键词] 中国式现代化；整体性探究；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
[中图分类号] D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7453（2023）06-0022-11

现代化是一个人类可以主动作为也能够有所作为的自然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原创性的理论命题，也是一个独特性的实践课题，它深深扎根于中国泥土却深度影响世界历史进程，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上将人类现代化推向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提出和阐述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既是党的二十大基于历史与现实的理论创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最新成果，[1] 同样还是助推人类发展的历史创造。党的二十大报告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及其推进过程中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2] 这是基于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的视角凝练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鲜明特色、世界历史影响和科学社会主义重大贡献。长在中国并影响世界的中国式现代化，[3] 不仅

[作者简介] 郭庆松，上海应用技术大学党委书记、教授，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上海市领导科学学会会长。

创造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时间层面上高度压缩的历史奇迹，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有别于其他现代化发展的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4] 这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整体性探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渊源、历史发展和实践遵循，从中国式现代化的偶然性中洞察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必然性和规律性。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整体性思维体现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者相统一的分析问题视角之中；“三个逻辑相统一”对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整体性以及从整体性角度把握所要研究对象的性质和方向具有方法论意义。[5] 同样地，基于整体性视角在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三者相统一中洞察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有助于我们从纷繁复杂、纵横交错的理论、历史、现实中抓住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刻内涵和本质要求，增强我们在躲不开、绕不过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的深层次矛盾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在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的国际形势中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历史影响，有助于我们在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相互关系中揭示人类现代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增强我们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中抓住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和历史机遇。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逻辑：具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禀赋

一般来说，理论逻辑体现研究命题本身要素的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定性，显然，这种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定性决定命题本身的性质和方向，[6] 同时也规定命题所关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的根本属性、体系结构和逻辑关系等。从研究命题本身的必然性联系和内在规定性观之，中国式现代化基于也超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体现当代中国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实践要求，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现代化的智慧基因和价值理念，实现了人类现代化追求的中国创造，形成了现代化理论与实践的“中国版本”，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成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性质和方向是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具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性质并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所关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主要包括有关现代化的根本方向、领导力量、核心主题、发展道路、基本特征、根本价值、总体目标、战略步骤、重点任务、根本动力、推进路径、思想方法、战略保障等诸多方面，[7] 显然，这些问题构成了逻辑严密、框架清晰、内涵丰富的完整体系。基于此，探讨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禀赋，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源”，源远才能流长；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和治国智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根深方能叶茂。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系统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结合。

（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源”

马克思主义恒久不变地写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不断向前推进的，因此，对中国式现代化进行理论溯源，根本上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这不仅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性质不变的根本要求，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实践行稳致远的必要前提。当然，这不是说我们不能研究借鉴其他有益的知识体系和逻辑方法，但在借鉴和采用其他知识和方法时不要忘了甚至背弃我们的“老祖宗”，否则就会失去科学判断力，[8]

这是确保基本立场正确和科学判断力强大的根本前提。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从对以资本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实质的揭示和弊端的清算开始的。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充分肯定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步性并积极褒扬现代社会形成以来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他们所宣称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资本主义现代性后果，[9]促进了生产力的极大发展和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进而也提升了人们的现代素养和文明程度，资本主义现代化收获了人类发展和生产力进步的一系列积极后果。这就如马克思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10]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也通过对资本现代性的内在逻辑及其所体现的对抗性关系的无情批判，并对异化劳动与异化现象的普遍性体现资本逻辑直接结果的深刻揭示，一针见血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难以避免的弊端以及资本主义现代化必然的消极后果，强调必须通过社会变革来形成特定的社会制度以适应现代化的要求。正如马克思所说：“必须推翻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11]这种“走向现代性的未来理想样态”，实质上就是以现代化发展的新版本取代不合时宜的旧版本，以生产关系的不断变革与调整以适应生产力的现代化发展需要，说到底就是要以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来取代资本主义性质的现代化。

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也体现在对现代化发展的战略构想和根本立场方面，主要包括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致力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等。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基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所讲的“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2]就是这一立场的鲜明表达。正是秉持这一立场，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实现现代化的一切理论和奋斗中，都始终将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的价值追求，从而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的始终追随。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目标导向，马克思明确讲要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以及“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13]可以肯定的是，资本逻辑缺乏共同富裕的基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制度逻辑无法带来共同富裕的后果，而共同富裕是马克思主义倡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根本分水岭。当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终极追求，马克思所畅想的人类社会的第三种形态就是人的能力的全面发展。显然，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就是要求人摆脱对物和人的双重依赖，实现人类的自身解放，这是人类发展最高境界与人类现代化最终目标的高度统一。

此外，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还表现在对人类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阐释和多维性探索上，突出表现的就是马克思晚年有关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理论设想，这是东方社会可以走不同于西方社会现代化发展道路的理论依据，为东方国家摆脱落后局面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理论支撑。马克思看到了俄国农民和土地制度的特殊性，断言俄国公社有可能“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占有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14]就是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而直接进入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实际上道出了经济落后国家的现代化模式有可能与发达国家完全不同，这也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世界上既不存在

定于一尊的现代化模式，也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现代化标准”[15]的重要理论依据。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关现代化的价值理念和治国智慧构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割不断的文化根脉，作为忠实的继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一直积极从中汲取有益的营养和合理的成分。毛泽东鲜明提出：“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6]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治国安邦的价值理念、思维方式、精神力量、科学方法等都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文化资源，而且它们与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和价值理念也有相容和契合的一面。

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邓小平对现代化“小康之家”的中国式表述饱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理念。中国古人所谓的“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民亦劳止，汔可小息。民亦劳止，汔可小愒。民亦劳止，汔可小安”。（战国·孔子《论语·季氏篇》）这实质上是民众对休养生息、国泰民安的期待，民众追求的是安乐安宁、舒服殷实的社会生活。儒家思想家将“小康”视作比“大同”社会较低级的一种社会状态，意指人民富裕安康的社会局面，就是所谓的“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贵族世袭）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设置）田里……是谓小康”。（战国·孔子《礼记·礼运》）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所倡导的共同富裕就是与“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篇》）、“损有余以补不足”（《汉书·食货志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西汉·戴圣《礼记·礼运篇》）等传统价值理念一脉相承；中国式现代化所提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就是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汉·司马迁《史记·管晏列传》）、“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战国·孔子《论语·述而篇》）、“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战国·孟轲《孟子·滕文公下》）等古人价值追求十分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所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就是与“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春秋·老子《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不涸泽而渔，不焚林而猎”（汉·刘安《淮南子·主术训》）、“回归自然，天人合一”（宋·苏东坡《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等价值理念紧密关联；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的和平发展道路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与“天下和平，则灾害不生”（西汉·董仲舒《春秋繁露·郊语》）、“为万世开太平”（北宋·张载《西铭》）、“先王之道，以和为贵；贵和重人，不尚战也”（唐·李筌《太白阴经·贵和篇》）等传统价值理念息息相关。

还需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式现代化中所表现出来的奋斗精神、和谐情怀、集中统一观念、忧患意识、集体主义精神、国际主义精神等思维方式和精神力量，都可以在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对应的思想资源，那就是自强不息、贵和尚中、大一统、居安思危、和而不同、协和万邦等，[17]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民为邦本思想、中庸思维、整体性思维、入世求实观念等都在中国式现代化中得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8]此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科学方法诸如“以道御器，道器合一”“治大国如烹小鲜”“犯其至难而图其至远”“经国序民，正其制度”“治国者，必以奉法为重”“破立并举，革故鼎新”等，也都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可以借鉴的。

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体现为对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性的遵循

理论逻辑离不开历史逻辑，甚至可以说，理论逻辑是蕴藏在历史逻辑中的，它从历史逻辑中来，在历史逻辑中发挥作用，因此，在研究理论逻辑的同时必须研究历史逻辑。[19] 历史逻辑，本质上就是对历史渊源的遵循和对历史规律的坚守，体现为对事物发展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性的追寻。从文化根脉上观之，中国式现代化从中国古人智慧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走来，实现了中国古人现代化智慧基因和价值理念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历史渊源和历史规律观之，中国的现代化萌芽并发端于近代中国历史时期，思考并提出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实践探索和积极推进是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拓展和创新突破则是发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体现为对中国近代以来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社会发展历史必然性和历史规律性的追寻与遵守。

（一）中国现代化道路：萌芽并发端于近代中国历史时期

鸦片战争拉开了近代中国历史的序幕，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萌芽并发端于这一历史时期。一方面，中华民族的劫难就此开始，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另一方面，人民奋起反抗、拯救民族危亡以及各类社会运动纷至沓来，谋求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现代化思想、探索、运动不断发生、发展，也是这段历史的鲜明特征。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的81年时间内，中国曾经发生过三次比较大的现代化思潮和运动，分别表征为不同核心内容的现代化追求即物的现代化、制度现代化以及思想和文化现代化，分别以洋务运动为代表、以戊戌变法为代表、以五四运动为标志。[20]

当然，这三次现代化追求并不是截然分隔、互不相关的，而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的。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的洋务运动重在器物层面的现代化并主张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民用工业乃至发展教育文化等，但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以及张之洞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思想和文化层面的主张也成为现代化的重要追求并在洋务运动中得到充分贯彻。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实施，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派推动的戊戌变法试图通过政治制度变革来推动中国制度层面的现代化进程，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是制度现代化的革命性成果，这期间还先后设想甚至尝试过的制度形式包括君主立宪制、复辟帝制、议会制、多党制、总统制等，这些都是制度现代化的追求；与此同时，包含三本书在内的孙中山的《建国方略》，从1917年开始写作并于1924年作为合集正式出版，可谓思想和文化层面的现代化主张，其中的《孙文学说》侧重于“心理建设”、《实业计划》侧重于“物质建设”、《民权初步》侧重于“社会建设”，特别是《实业计划》更是包含了交通、港口、植树造林、移民、矿业发展和农业水利、三峡大坝等六大计划，器物层面的现代化设想也是跃然纸上。1919年发生的五四运动是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也是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促进新思潮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同时，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阶级、思想和干部上做了直接准备，也为思想和文化现代化发挥了进一步启蒙的积极作用，还为器物现代化、制度现代化进一步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

思想和文化基础。不过，总体上来说，近代历史上的这些现代化追求都是中华民族仁人志士基于救国救民、救亡图存的初衷和理想，现代化只是表征，挽救民族危亡乃是实质。

（二）中国现代化问题：思考并提出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四运动打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大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残酷的革命斗争的同时开始思考并提出中国的现代化问题，甚至可以说革命所要追求的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目标本身也是现代化运动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瞿秋白、张闻天等人曾经述及过现代化概念，但较早提出并探讨具有现代意蕴的现代化概念的重要代表人物是毛泽东和周恩来。[21]1938 年 1 月 7 日，周恩来在《怎样进行持久战》一文中立足于持久抗战的视角论述了“现代化的军事工业”“装备的现代化”和“军队现代化”等问题；[22]1938 年 5 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还明确提出了“革新军制离不了现代化”，并从灵活的战略战术、进步的政治精神、一定限度的民主化等几个方面加以论述。[23] 显然，这些都是立足于军事斗争色彩的现代化概念及其表达。

立足于经济社会视角的现代化相关论述则是出现在毛泽东于 1940 年 1 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中，他明确提出要建设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以及“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现代化中国。[24] 在 1945 年 4 月党的七大《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毛泽东又明确提出：中国工人阶级的任务，不但要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而且要建设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25] 及至 1949 年 2 月，毛泽东在会见苏联客人时也提出了“要建设崭新的、现代化的、强大的国民经济”的设想，[26] 这是有关经济社会视角现代化概念的正式表达。尤其是在 1949 年 3 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不仅从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化命题，断言我们“取得了或者即将取得使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步地向着现代化发展的可能性”，而且还从国民经济产业的角度论述中国现代化问题，强调我们要引导“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百分之九十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向着现代化和集体化的方向发展”。[27]

（三）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践探索和积极推进于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

新中国成立为中国的现代化实践探索和积极推进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开始深入思考并系统谋划国家现代化建设问题。我们党确立的“一五”计划（1953—1957）的指导方针和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发展重工业”，以此“建立国家工业化和国防现代化的基础”，同时“发展交通运输业、轻工业、农业和商业”。[28]1954 年 9 月，周恩来在第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建设“四个现代化”即“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的要求。[29]1964 年 12 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又一次提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新的“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并要“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30]

改革开放以后，党和国家工作中心发生了战略转移，中国的现代化的探索和推进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特别强调现代化建设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分步走战略。邓小平反复强调：“我们搞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现代化”。[31]“我们搞四个现代化，是搞社会主义的现代化，不是搞别的现代化”；[32] 江泽民明确指出：中国的发展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贡献，中国人民坚决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33] 江泽民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概念，要“发展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个文明的协调发展”；[34]1997 年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在 21 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即“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2002 年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35] 胡锦涛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现代化”；[36]2005 年 2 月，胡锦涛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问题，明确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三位一体”发展成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四位一体”，[37] 此后，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目标正式确立；2008 年 9 月，胡锦涛进一步提出了“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38]“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初步形成；及至 2012 年 11 月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至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正式确立。

（四）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拓展和创新突破于党的十八大之后

党的十八大拉开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序幕，也拉开了中国式现代化成功拓展和创新突破的帷幕。在这一新的历史时期，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就是创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实践上的突出贡献就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拓展和创新突破充分体现了这种理论发展与实践成就的紧密结合，主要包括重新制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高度凝练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全面概括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系统锚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等。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明确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的重要内容，[39] 党的二十大报告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一步明确为中国共产党中心任务的重要内容。[40] 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从 2020 年到本世纪中叶分两个阶段的新时代“两步走”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为 2020 年到 2035 年即第一个 15 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第二个阶段为 2035 年到本世纪中叶即第二个 15 年建成现代化强国。[41] 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2020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上强调了 5 点，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42]2022 年 10 月，党的二十大不仅对上述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和中国特色进行了进一步强调和加以系统化论述，而且还明确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九个方面的本质要求和五个方面的重大原则。至此，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要求更加成熟定型了。

三、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五个重大原则”是我们必须紧紧扭住的“牛鼻子”

从“三个逻辑相统一”来看，理论逻辑、历史逻辑是对实践逻辑的理论反思和历史追问，因此，它们都统一于实践逻辑；理论逻辑是从历史中走出来并发展起来的，历史逻辑是对过去了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而实践逻辑则是对正在进行的实践活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的概括，这就需要我们把实践逻辑从

历史逻辑中剥离出来。[43]从反映客观关系和社会联系体现问题导向的系统实践来看，党的二十大所凝练的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牢牢把握的“五个重大原则”是我们系统解决问题必须紧紧扭住的“牛鼻子”，这实际上提出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所关涉的核心要素。“五个重大原则”体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根本”，即根本统领、根本方向、根本立场、根本动力、根本品格。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形势决定了我们牢牢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这些重大原则并以此为基准来化解风险、应对挑战、面对不确定性，这内在地体现了中国式现代化鲜明的实践逻辑。

（一）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根本统领

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重在把党的领导落实到党和国家事业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大党在大国长期执政，这是我们的基本党情和基本国情，也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考虑的基本背景和现实条件。这样的党情和国情决定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既有资源丰富、韧性无比的相对优势，又有诉求多样、整合困难的相对劣势。立足于发挥优势、克服劣势、解决问题的视角，以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三个方面尤为重要：一是在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上要有新作为，这是在指导思想上与时俱进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有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里的关键是要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现代化智慧相结合，同时借鉴其他现代化理论的合理元素，完成中国式现代化理论构建的历史任务。二是在健全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上要有新作为，这是在体制机制上不断完善的必然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党的领导必须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其中的关键是要求健全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的制度体系，包括完善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所涵盖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中的具体制度以及确保这些制度有效运转的监督保障体系。三是在解决妨碍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贯彻执行的具体问题上要有新作为，这是在工作推进上不断改进的必然要求。党领导中国式现代化在具体工作推进中需要一个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严密组织体系，实质上就是要建立健全确保中国式现代化顺利推进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而且需要一个左右协调、融合发展的综合运转体系，实质上就是要确保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与改革发展稳定各方面工作有机结合起来。

（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根本方向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重在坚持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通过百年奋斗在中国大地上创造性地提出并进行积极实践的，其目标指向就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正确的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没有脱离也不能脱离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而是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中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发展要求紧密结合起来的中国式创造的方向道路形态。在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既不能走封闭僵化的老路，更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对于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老路不会带来国家繁荣昌盛，邪路只会将国家事业引入歧途，因此，老路、邪路都是死路、绝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关键在于既坚持人类现代化道路的普遍规律，又彰显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前者表现为生产力社会化所带来的财富积累、技术改进、交往拓展、文明积淀等现代化成果；后者表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取得政治独立和民族解放，继而建立独立自主的经济体系和

国家发展基础，再通过全面开放走向世界而实现自身的现代化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走出了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以及把中国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新路子。

（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是根本立场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重在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品格，人民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最根本的立场，正是植根人民之中，马克思主义才具有跨越国度、跨越时代的影响力，正是为了人民利益，马克思主义政党才具备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的感召力。人民是逻辑起点，人民是价值旨归，只有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现代化才有不竭的动力，现代化之路才能越走越宽广。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概括的中国式现代化的9个本质要求中，与“人民”直接关联的就有3个：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政治现代化方面提出的独特要求，突出的是人民在政治民主上的现代性追求；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是中国式现代化在文化现代化方面提出的独特要求，突出的是人民在精神生活上的现代性追求；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在社会现代化方面提出的独特要求，突出的是人民在社会公平上的现代性追求。实质上，经济现代化与生态现代化也无不与人民性密切关联：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指向就是为了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因此，高质量发展也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必须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生态需要、保障人民生态共享，努力实现生态美与百姓富的有机统一，因此，生态现代化的目标指向也是为了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总之，“五位一体”的现代化建设，都是离不开人，都是为了切实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的实际问题和现实诉求，深刻体现现代化建设的人本属性。

（四）坚持深化改革开放是根本动力

坚持深化改革开放，重在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的，又是在解决问题中不断深化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推进和深化的，又是依靠改革开放不断书写经济社会发展奇迹的。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成果不仅是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物质成果，而且建构了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以及全方位的改革开放全新格局。正是基于此，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才能够提上议事议程。但从世界文明的相互借鉴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影响来看，尽管我们说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对世界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因其对传统现代化的扬弃特别是部分否定而必然面临更大的挑战，一些西方国家视中国为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凭借他们在经济、技术、金融、军事上的优势，采取各种手段、不惜任何代价来遏制打压中国，无所不用其极，这就是明证。毫无疑问，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也是当下解决矛盾、应对挑战的关键一招。坚持深化改革开放，不仅是应对中国式现代化面临挑战的需要，也是应对复杂多变国际形势的需要，本质上更是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的需要。高质量深化改革，就是要通过深化改革来破除现代化进程中的体制机制障碍，增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同时也增强政府调控经济的能力，推进高标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扩大国内市场容量，提高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质量；高水平对外开放，就是要更为主动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和

国际竞争，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特别是通过制度性对外开放，增强国内经济与国际经济的相容性，从而建设高水平开放型经济体制，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度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用好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外部空间。

（五）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是根本品格

坚持发扬斗争精神，重在依靠顽强斗争打开事业发展新天地。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就是一部与天斗、与人斗、与己斗的伟大斗争史，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积攒了改造主观世界的革命斗志。革命战争时期，我们坚持与一切反动势力作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坚持与一切妨碍社会主义国家建设的势力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斗争；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坚持与一切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作斗争。新时代十年，我们义无反顾地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同贫困落后作斗争以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坚持同环境污染作斗争以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改变，坚持同党内腐败和作风问题作斗争以推动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坚持同妨碍国家安全各种势力和因素作斗争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等。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坚持发扬斗争精神，需要我们从内外环境结合上看待斗争的对象问题。就内部环境而言，我们将遭遇改革发展稳定深层次矛盾以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中的顽固性、多发性问题等，斗争的对象就是所有这些矛盾和问题，以斗争精神直面矛盾和问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就外部环境而言，我们所面临的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斗争的对象就是所有打压遏制中国发展的各类势力和各方因素，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维护国家尊严和核心利益。

[参考文献]

[1]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N].人民日报,2023-02-08.

[2][40]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3][7][18]郭庆松.从内涵、性质上认识中国式现代化[N].北京日报,2022-09-05.

[4][39]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5][6][19][43]张雷声.关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实践逻辑相统一的思考——兼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研究[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9,(9).

[8]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G].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341.

[9][10][11][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404,405,10,411.

[13][1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814,830.

[15][42]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四卷[G].北京:外文出版社,2022:123,164,503.

[16][23][24]毛泽东选集: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511,663.

[17]臧峰宇.马克思的现代性思想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逻辑[J] .中国社会科学,2022,(7).

[20]秦宣.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探析[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2).

[21]程美东.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文明蕴涵[J].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9).

[22]周恩来军事文选:第二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85.

[25]毛泽东选集:第三卷[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81.

[26]金冲及编.毛泽东传（1893—1949）[G]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947.

[27]毛泽东选集:第四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30,1432.

[2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

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709.
[29]周恩来选集:下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132.
[3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九册[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483.
[31][32]邓小平文选: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9,110,226.
[33][34]江泽民文选: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112,574.
[3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14.
[36]胡锦涛文选:第三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589.
[37]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1025.
[38]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G].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570.
[41]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17-10-28.

责任编辑:刘翠霞

The Logic Path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from A Holistic Perspective

Guo Qingsong

[**Abstract**] To make a holistic inquiry into Chinese modernization, we need to grasp its theoretical orig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evidence-based practi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oretical logic, Chinese modernization embodies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fin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Marxist modernization theory is the "source"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while the value and wisdom of national governanc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are the "roo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logic, Chinese modernization is embodied in the pursuit and observance of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nd laws of social development in modern China, especially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ractical logic, the "Five Principles" that we must firmly adhere to are the fundamentals to systematic problem-solving, and they constitute the fundamental leading force, direction, position, driving force, and character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Key Words**] Chinese Modernization; Holistic Inquiry;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